

# 辛亥革命 与 百年中国

第二册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 民元前后姚雨平统率的广东北伐军研究

冀满红 张远刚\*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与清军在长江流域及其相关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为了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南方各省相继派出了北伐军，姚雨平所统率的广东北伐军就是其中的一支。广东北伐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为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立下了赫赫战功，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迄今为止，尚未见对这支功勋军队全面研究的成果问世。本文即拟对这支北伐军的相关问题作些探讨。

## 一 广东北伐军的组建

在全国革命大势及广东省内各界的共同作用下，广东于 1911 年 11 月 9 日获得光复。同盟会的重要领袖人物胡汉民被广东各界推举为都督，很快广州革命政府组织了起来。率军在惠州起义的陈炯明在消灭了地方清军后，率领所部盾军开进广州城，即被选为广东副都督，广东新军统领黄士龙（按：有些著作及史料中也写作黄世龙，二者实为一人）因反正，暂时支持革命而当上了参督。对于广东革命党人来说，挥师北上，平定幽燕乃是其革命志向。但刚成立的广东革命政府鉴于省内复杂的形势，并没有立即派遣军队北伐，而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省内的稳定建设上。

武昌起义后不久，清军大举进攻汉口。湖北军政府于 1911 年 11 月 13 日向起义各省发出通电：“北伐队行将出征，惟此为直捣黄龙之举，亟应厚增兵力，各省如自度兵力有余，即应派兵联合助剿。”<sup>①</sup> 广东军政府积极响应，

\* 冀满红，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远刚，时为暨南大学历史系在读硕士生，现为广东珠海市斗门区和风中学教师。

① 《专电》，《申报》1911 年 11 月 14 日，第 200 页。

通电欲组织一支 8000 人北伐军驰援。<sup>①</sup> 湖北军政府的号召及广东军政府的响应很快就在广东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人提到北伐“无不摩拳擦掌，愿往敌前”，军界有人提议成立“北伐决死队”，学界提议仿照上海成立“广东学生北伐队”，甚至连汉光社也上书都督胡汉民表示积极支持北伐。<sup>②</sup>

广东军政府先组建了北伐军先头部队，这支援军迅速北上，于 11 月 22 日晚投入到光复南京的战斗中。<sup>③</sup>

11 月 27 日，汉阳防卫战失利，汉口、汉阳二镇失陷，同时南京攻坚战陷入胶着状态。这种形势给当时各省军政府以极大的冲击。在汉阳失守的第二天即 11 月 28 日，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向临时议政机关——广东省各界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个关于北伐的议案，大会一致赞同。<sup>④</sup> 胡汉民本拟亲自统军北伐，但未获大会同意，便任命在枢密处任职的姚雨平为总司令，组织广东北伐军。胡汉民任命姚雨平为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可谓知人善任。姚雨平早年参加革命，一直从事新军工作，在新军中有很大影响，同时他对北伐的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武汉民军几度被清军击败，革命前途尚未可乐观，此时广东应急出师北伐以壮声势，而牵制清军实力。”<sup>⑤</sup>

但是，北伐军的组建并不顺利，军政府内部对北伐有不同声音，参都督黄士龙就是代表。黄士龙先是反对北伐：“北伐似非其时，粤人不能于严冬在大江南北作战，遑论黄河流域？且粤局未大定，多出精锐，一旦大局有变，何以镇压，不如先固粤。”但是遭到了胡汉民反对：“革命在进取，不再保守，斯时满汉之争斗，乃渐变为南北之决战，若我方形势顿挫，即粤亦无能割据苟安。况粤正患兵多，内部亦无何等顾虑，至气候差别，自当注意防寒，岂能坐待来年解冻，方出义兵？”副都督陈炯明也赞同胡汉民的主张，黄士龙才放弃了反对意见。接着，黄士龙又觊觎北伐军总司令的职位。12 月 8 日，就在北伐军即将出发之时，黄士龙会晤胡汉民，声称愿亲自统军北伐，且可辞去参都督，但遭到了胡汉民的回绝。<sup>⑥</sup>

其实，副都督陈炯明也在谋求北伐军总司令的职位。姚雨平担任北伐军

<sup>①</sup> 《专电》，《申报》1911 年 11 月 19 日，第 272 页。

<sup>②</sup> 《粤军北伐之先声》，《申报》1911 年 11 月 24 日，第 345 页。

<sup>③</sup> 《会师攻克金陵之先声》，《申报》1911 年 11 月 27 日，第 385 页。

<sup>④</sup> 《粤省之大会议》，《申报》1911 年 11 月 28 日，第 401 页。

<sup>⑤</sup> 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1978，第 125 页。

<sup>⑥</sup>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第 53~54 页。

总司令后；陈炯明还于 1911 年 12 月 3 日发表《宣告北伐志愿书》：“满胡非我族类，窃据中国，逞狼子野心，制我汉族，害无弗恣，炯明痛之恨之，誓志灭胡……不出三日，即当亲率北伐之师……誓为北伐中之一人。”<sup>①</sup> 表达其统军北上的志向，后经众人挽留才在 12 月 5 日的各界代表大会上称，“今日粤省大局危急，鄙人前在惠州誓为北伐，今见此危象，亦不得不暂留整顿”，<sup>②</sup> 才放弃了统军北伐。

按陈炯明的计划，他当北伐军总司令，整编广东各路军队，组成一支强大的北伐军，姚雨平先期组织的北伐军也并入这支军队。但是，姚雨平因在广州起义时曾发生过矛盾而不愿受陈炯明的节制。面对内部纷争，胡汉民与朱执信也认为：“北伐军既由各省陆续出发，其至前方，当更有统一指挥者，而各都不便事事遥制。且必成大军而后发，则有后时之忧。”故胡汉民“虽从陈之请，而仍令雨平先发”，实际上是间接否决了陈的计划。<sup>③</sup> 陈炯明虽然未能成行，但其行动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 12 月 5 日黄兴在电请胡汉民派兵北上的电文中就说：“南京光复，济兵（即黎天才所统的济军，也叫辅军）之力最多。请再调数营前来会合北伐，必资得力。闻竟存兄（陈炯明）兵亦北上，喜极！”显然是对陈炯明北上期望极高，而完全不知道此时广东方面准备派姚雨平统军北上。故胡汉民在复电时才说明：“现已公举姚雨平为正司令，督师北上。”<sup>④</sup> 甚至后来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还让陈炯明厚集兵力，以备不时之需。名虽在外，实不能动，这也就是陈炯明对没能统兵北伐耿耿于怀的一个原因，因此即便在胡汉民随孙中山北上、陈炯明代理都督时对北伐仍念兹在兹：“届期俾炯明祃纛长江，饮马黄河，犁庭扫穴，为我同胞洗清二百六十年之腥秽”。<sup>⑤</sup> 收取北伐之功的机会被姚雨平得到，那么陈炯明嫉恨姚雨平也就好理解了，以至于后来对北伐军的饷项、军火、器械时常掣肘，而且还深深地影响到了北伐军的最终命运。

在各方的努力下，北伐军很快就组建了起来。其具体编制大致是，总司令下设 4 团，其中新军 2 团，防营 2 团，炮兵，机关枪，辎重，工程，卫队

<sup>①</sup> 《百粤人士之北伐热》，《申报》19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5 页。

<sup>②</sup> 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北，李傲出版社，1995，第 68 页。

<sup>③</sup>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第 53~54 页。

<sup>④</sup> 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第 244 页。

<sup>⑤</sup>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 7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 238 页。

各一营，此为正规编制。此外，还有一些特殊队伍，包括北伐决死队、华侨爆弹队（炸弹队）、学生地雷队、宪兵队、卫生队和女子北伐队等。<sup>①</sup>正规部队是北伐军的主体力量，其中新军受革命影响最大，比较简单，北伐军的中坚。特殊编制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决死队是北伐军的最早组成部分，这个由100多人组成的队伍是姚雨平亲手组建领导的，用于发动广州起义的别动队，直接编入北伐军。华侨炸弹队是南洋华侨在辛亥革命时期自发组织的援助国内起义的队伍。他们自筹粮饷、武器弹药，回国后首先就来到了广州，在得知姚雨平组建北伐军后就要求加入。姚雨平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曾在南洋进行过一些革命活动，与南洋华侨有一定联系，因而就接受了该队。决死队和炸弹队后来成为北伐战争中的突击队，他们不畏敌人炮火，协同共进，勇猛善战。至于女子北伐队，是受当时上海同类队伍的影响而出现的。全队只有30来人，也参加了北伐战争，但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其所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在广州掀起了不小的北伐热。广东北伐军全军约8000人，武器装备精良，计有德国造退管炮18尊，炮弹1万余发，步枪子弹300万发，机枪子弹50万发，军衣均为新制，实力非常雄厚。

北伐军司令部的编制为：总司令姚雨平，副总司令马锦春，参谋长陈雄洲，高级参谋林震，还有秘书处、机要课、经理局、军需部、管理部、军法部、军医部、交通部、间谍部、马医部、稽核部等11个直属机关。副司令陈锦春和参谋长陈雄洲在北伐军出发后企图阴谋夺权，为姚雨平、林震等人所察觉，二人先后去职，以后也就在取消了副司令一职。北伐军暂驻上海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员张文和李济深来投效，不久就被分别破格委任参谋长和参谋。

关于北伐军的出发时间及批次，姚雨平后来的忆述和胡汉民当时所发的电文的记载不一。姚雨平认为北伐军共分三批出发，其忆述主要涉及前两次：“我即派高级参谋林震率领一团赴上海、南京筹备，大队（主体部队）旋于十月十八（12月8日）由广州乘船出发。”<sup>②</sup>而胡汉民在给黄兴的电报中称：北伐军“分为两次开行，马锦春已定于二十日（12月10日）出发，姚雨平则后一二日出发，约期二十四五日可抵沪”。<sup>③</sup>在此，北伐军第一批由马锦春和林震率领部队当于十月二十日出发没错。据《申报》二十一日香港

<sup>①</sup> 姚雨平：《武昌起义后广东出师北伐的经过》，《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第181页。

<sup>②</sup> 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第244页。

<sup>③</sup> 姚雨平：《武昌起义后广东出师北伐的经过》，《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84页。

电称，广东民军乘招商局轮船途经香港为英舰所逐。<sup>①</sup>这批北伐军随后于二十四日到达上海，<sup>②</sup>与胡汉民的估计相吻合，而且他们在到达上海后第二天给沪督陈其美的照会公文里也说明了他们确实于十月二十日出发。<sup>③</sup>胡汉民关于北伐军第一批的出发时间的正确，显然也说明了姚雨平关于主体部队的出发时间是有问题的。据《申报》报道，北伐军的主体部队是在之后的十月二十五日（12月15日）才由广州出发，十月二十九日（12月19日）到达上海的。<sup>④</sup>而当时广东北伐军最主要的就是这两批部队，故胡汉民所言是其计划，本无误，只是他在孙中山回国后就与之一同去了上海，无法看到北伐决死队等不知何故落下的第三批部队在1月5日才到达上海（出发时间无考）。也就是说，姚雨平认为的北伐军共分三次出发是正确的。北伐军大队在上海会齐后就于12月26日开赴南京，驻扎在南京城碑亭巷协统衙门。

广东北伐军的顺利组建，胡汉民功不可没。作为同盟会的元老，胡汉民革命目标明确，革命信念坚定，选择姚雨平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后就毫不动摇地给予大力支持，妥善地处理应对了广东军政府内部关于北伐军的纷争，才使广东北伐军得以组建并顺利出征。

## 二 战争与政治

12月2日，清朝将领张勋坚守的南京城终于被苏浙联军攻陷，南北对峙的局面开始出现。胜利的消息鼓舞了革命党人，江浙联军很快组织了北伐联合会，号召起义各省派兵赶赴南京，成立北伐联军，一鼓而下幽燕。广东北伐军组建后立即赶往南京，成为第一个前去回合的外省军队。面对汹涌的北伐洪流，袁世凯感受到了压力，开始与南方革命党人接触，企图以和谈来缓和革命军的猛烈进攻，而南方军政府中的立宪派也力主停战，举行和谈。

12月18日，南北议和终于在上海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各支北伐军只能宣布倘若议和无成，即挥师北上。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不甘心失败的清政府在军事上又蠢蠢欲动。对此，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于1月3日向议和代表团发出通电：

<sup>①</sup> 《译电》，《申报》1911年12月12日，第594页。

<sup>②</sup> 《广东北伐队过沪》，《申报》1911年12月16日，第657页。

<sup>③</sup> 《粤省北伐队种种》，《申报》1911年12月17日，第667页。

<sup>④</sup> 《粤东第二队北伐军出发》，《申报》1911年12月23日，第743页。

“民国已经成立，更何带召集国民会议，决定政体。代表团代表国民公议，义理昭彰。北虏巧言召集大会，推到成局，其心好险，尽人可知。且停战延期，我老师众，敌后设备，一朝决裂，无悔可及。敝军北来，志在灭胡，停战误国之罪，义不敢戴。况太原皖北，衅自彼启，即今痛剿，咎不在我。惟既经尊处议决，自不得不暂停进取。今自议决之日起，北虏如再违约南侵，敝军即整师北向，不复瞻望。”<sup>①</sup>这一通电是姚雨平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认识，表达了其对民国政权的坚决拥护，揭露了清政府的不守信用，并对其卑劣的政治军事行径予以警告，说出了各路北伐军的心声，是对民国政府及议和代表团的一种政治声援。

1月上旬，议和处于胶着状态，南方要求共和，北方则主张立宪。战争作为政治的外延能发挥达到政治目的的作用，南北双方都明白这个道理。袁世凯一面谋求停战，一面进行军事部署，准备随时进攻南方革命政权，派段祺瑞统大军威胁武汉，让张勋和倪嗣冲南下逼近南京。南京临时政府也做出了积极地军事应对，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还亲自制定了北伐大战略：现在用兵方略，当以湘鄂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进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军即达第一之目的，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破虏巢。同时还倡言，和议一破，本总统将亲统江皖之师，大举北伐。很快陆军部也正是下达了这一作战方略。<sup>②</sup>孙中山还给当时的代理粤督陈炯明发电令其厚集兵力，严加训练，广储钱粮，以备战时之需，民国政府积极地投入了北伐的准备中。

面对战争阴霾笼罩的时局，为了增强作战能力，姚雨平对广东北伐军做了一次整编。整编后的广东北伐军编制为2旅2独立营，每旅下设2团。张我权任新军旅旅长，张桓杰和吴庆恩分别担任团长；隆世储任防营旅长，曾传范和张定国分别担任团长；陈佑卿任炮兵营营长，谢达文任机关枪营营长。经此整顿，再加上颇为严格的训练，广东北伐军军容甚整，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粤军彩枝气象一新，岭南健儿戎装鹄立，均三十岁以内，

<sup>①</sup> 《公电：驻宁粤军电》，《申报》1912年1月3日，第32页。

<sup>②</sup>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5，第14页。

精装子弟，服装整齐，举动活泼，一望而知为劲旅。”<sup>①</sup>广东北伐军渡江北上后不久，还收编了一支由邹鲁推荐来的淮军，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扩编。与此同时，姚雨平还进行了具体的战前部署：“高级参谋林震为前敌总指挥，设总司令部于蚌埠车站，全军作战计划由参谋长张文拟定，前线和行营各设指挥部，由李济深和张文分任之。遇有大事，始由总司令裁决。”<sup>②</sup>从这个部署中可以看出，姚雨平比较精通兵家谋略。军队在前线作战应该随机应变，前线指挥官应该有便宜行事之权。姚雨平放手让林震、张文、李济深去发挥各自军事才能，同时又让他们分工合作，各展所长。这次整顿部署在后来的北伐战争中经受住了考验。诸事具备后，先头部队于1月15日渡过长江，驻扎在了事先由李济深筹备妥当的浦口营房。

当时参加宁皖方面北伐的军队除了广东北伐军，最有实力的部队还包括柏文蔚的镇军和朱瑞的浙军，此外较弱一点的部队有赣军、光复军、铁血军等。他们共同担负着在津浦铁路沿线及周围迎击清军的张勋和倪嗣冲部的重任。但这些军队各为旗号，各自为政。为了统一指挥，协调各部的作战行动，当时在南京各军总司令及其相关人员于1912年1月21日在碑亭巷广东北伐军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sup>③</sup>会上各军司令议定联合攻守，决定立即成立北伐联军参谋团（当时设在碑亭巷，战时随军而动），同时制定了《北伐联军参谋团章程》，由镇军司令柏文蔚、粤军司令姚雨平和浙军司令朱瑞三人联名签发。章程由缘起和10项条款构成，缘起里简单地表达了之所以成立联军参谋团，就是希望“军事上有协同之功，作战而收指臂之助，且可补助大总统暨陆军部、参谋部之不足”，同时还可以避免“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隐患，“诚一举而数得也”。10项条款规定了联军参谋团的各具体事项，如参谋团应由各军选派参谋代表二三员组成，选举其中一人为团长，组织领导团务。其中在参谋团职务中还特别规定了“惟各参谋关于计划方面，均需顾全大局，通筹利害，不得以己军之得失而影响全体之纵达”。此外还对参谋团人员的职责、义务以及与各军的关系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这实在是以后北伐战争打胜仗的又一大保障。<sup>④</sup>

1912年1月18日，广东北伐军主力部队渡过长江，其他各军也于此前

<sup>①</sup> 《记新南京三日之见闻》，《申报》1912年1月18日，第212页。

<sup>②</sup> 姚雨平：《武昌起义后广东出师北伐的经过》，《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85页。

<sup>③</sup> 《专电》，《申报》1912年1月22日，第244页。

<sup>④</sup> 《北伐联军参谋团缘起及简章》，《申报》1912年2月5日，第357页。

后相继北上，23日总司令部设在蚌埠火车站。而在此前不久，在津浦路沿线及其周围地区，张勋和倪嗣冲的部队分三路大举南犯。倪嗣冲侧攻颍州方面，张勋部在倪嗣冲的援助下担任津浦路的主攻，张部偏师往攻宿迁方面。北伐各军也作出反应，很快议定，浙军与镇军主力在颍州迎击倪嗣冲部，粤军全军与镇军葛应龙一旅沿津浦路迎战张勋，是为主力方向，光复军与赣军等进军宿迁方面。张勋主力由徐州南进，很快占领了宿州及津浦路上的战略要地固镇，目标直指广东北伐军总司令部。

广东北伐军主力在林震的率领下乘火车连夜前进，于26日清晨到达新桥，随即与南来的张勋部清军遭遇。张勋部发炮轰击，广东北伐军运兵火车多处受创，但官兵却并没有因此而惊慌，反而快速下车组织还击，凭借强大的炮火优势很快就将来敌击退。这次遭遇战显示了广东北伐军敌前指挥官优秀的指挥才能和官兵卓有成效的军事素质。

敌人退却后，粤镇两军即一面整军，一面制定了具体的对敌作战战术。决定由粤军攻击敌之右翼（东路），镇军攻击敌之左翼（西路）。27日早晨，两军按照既定的战术部署展开行动，由新桥向固镇推进。早上7点钟战斗新桥以北10里地方（固镇外围）打响，清军在此处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来护卫固镇。粤军将士奋勇冲击敌人外围工事，敌人不支，向后退入纵深阵地，继续抵抗。这时粤军强大的炮火优势再次显示威力，以此为掩护，步兵突击队炸弹队向前猛扑，清军阵地失守，退往固镇。粤军亦紧迫至固镇，开始了固镇攻坚战；镇军葛应龙部因为缺少火炮，很难突破敌人的阵地，在得到支援后打破敌人防守，来到了浍河边上（此河贴固镇而过），此时粤军正在激烈的进攻固镇，从正面吸引了固镇清军的主力。镇军得以轻松击退浍河对岸守敌，渡河成功后，继而迂回到了固镇之后，与粤军形成了对固镇的包夹。敌人见势不妙，仓皇逃走，固镇随即落入了北伐军之手。是役张勋部清军损失惨重，弹药枪炮、辎重马匹丢弃甚多，官兵伤亡被俘千余人，而粤镇两军合计才损失士兵40余名。真可谓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固镇之战所以能取得大捷，合理的战术运用是个关键。粤镇两军通力合作，使得战术预想完满落实，而且粤军还非常明显地发挥了自身的炮火和机关枪两种战术武器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效果很是明显。正如邹鲁所发的战况公电里所云：“炸弹队、机关枪队、退管炮队最为得力。”因此，固镇之战可以说成是北伐战争中一个较为经典的攻坚战。

固镇大捷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首先，固镇的胜利给南京临时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不但证明北伐军是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增强了政府对北伐的信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敌人给南京方面施加了巨大压力（包括军事和政治压力），加重了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谈判的筹码。孙中山在得知固镇大捷的消息后，立即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致电姚雨平和林震等人：“闻昨夜我军得胜，追敌数十里，足见指挥有方，士卒用命，甚堪嘉许。”<sup>①</sup>贺电发出之迅速，虽寥寥数字，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南京临时政府趁着胜利的锐气在谈判桌上加大了迫使清帝退位的力度，对清廷的态度变得更加的坚决。袁世凯企图再次展长停战期限，不但孙中山坚决反对展期，就连参议院亦全数反对，他们甚至预备增加北伐的力度，在南京光屯粮草，以接济前线。<sup>②</sup>而且很快参议院与内阁都议定以黄兴维北伐总指挥，统筹北伐的具体事项。<sup>③</sup>可以说固镇大捷给南京临时政府带来了活力。其次，固镇大捷对袁世凯集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当1月26日新桥遭遇战小胜为袁世凯得知后，就立即授意段祺瑞让其军队赞成共和。<sup>④</sup>而27日固镇为北伐军攻克后，袁世凯指使清军统领46人联名通电，要求皇室逊位，他本人则力辞不受清廷的侯爵封号。<sup>⑤</sup>而在战争爆发前袁世凯集团还坚决反对共和，此时则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袁世凯集团企图以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来封住革命军北伐的口实，把责任推到清廷那里。广东北伐军的胜利正好给袁世凯集团创造了一个迫使清廷逊位的绝佳机会，而这同时又会使得自己与革命政府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默契”，使其对自己产生好感，以利于以后的政治图谋。这就是固镇之战带来的戏剧性的政局变化。

固镇失利后，张勋部败兵退往宿州，但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1月29日，张勋部清军对广东北伐军发动了偷袭。广东北伐军在得到后路支援下，击退了张勋部的进攻。袁世凯得知此事后立即叠电张勋，责其擅自动兵，但这并不能阻止张勋的进犯势头。2月2日，张勋部向南推进至任桥北面的西寺坡，与广东北伐军林震所统之旅发生激战，战斗从下午5点持续到次日清

<sup>①</sup> 《临时政府公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第8页。

<sup>②</sup> 《昨日停战之期满矣》，《申报》1912年1月30日，第309页。

<sup>③</sup> 《专电》，《申报》1912年2月3日，第340页。

<sup>④</sup> 《专电》，《申报》1912年1月27日，第284页。

<sup>⑤</sup> 《要闻：北方军队赞成共和要电》，《申报》1912年1月29日，第300页。

晨，张勋部不支，再次败退。广东北伐军追至离宿州城十里地方，后路部队与镇军葛应龙部跟进集结。

2月4日，北伐军主动向宿州挺进，双方随在宿州城东面展开决战。北伐军方面，姚雨平亲自督率粤军、镇军支队及较弱的苏军一部进攻张勋。张勋亦亲统官兵2000余人，外加步队4营，炮队1营，马队2营及山东巡防队1000余人投入战斗，后新军第五镇4000余人援兵亦参加此战。是役双方投入兵力超过2万人。战斗于上午8时开始，姚雨平亲上前线指挥作战，北伐军士气大盛，勇敢冲锋，逼近敌人阵地，致使张勋部清军的远程野战炮难以发挥效力，而北伐军的山炮则在近距离搏杀中尽显威力。张勋派出精锐骑兵企图逼退北伐军，北伐军则巧妙地调集机关枪队以密集火力进行扫射，使其损失惨重，被迫退回。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2时许，张勋部清军大败，退往徐州。6个多小时的战斗，北伐军毙敌1000余人，俘获数百人，缴获许多枪械马匹等战利品。张勋派驻宿州的清军在林震与葛应龙的夹击下，于2月6日弃城逃往徐州。宿州城遂为北伐军所有，整个宿州会战大获全胜。<sup>①</sup>北伐军士气高涨，主动请缨，愿一战而下徐州。而张勋所部清军则士气低落，军心不稳，无力再战，只好龟缩在徐州城里。张勋被迫于战败第二天发出通电，表示赞成共和。<sup>②</sup>姚雨平率领的北伐军两战两捷，声势日隆，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宿州战役的胜利，促使南北和议进展顺利，南北双方在共和方面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清帝退位只是时间问题。这时驻扎徐州的张勋部清军发生哗变，变兵在徐州城里大肆抢劫，张勋难以节制。<sup>③</sup>在这种情况下，张勋一面稳定部下，一面与姚雨平接触，打算议和。袁世凯也给北伐联军参谋团发电请其停战。联军参谋团在宿州召开特别会议，认为与张勋停战议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议定“以距离宿州北三十里的符离集为两军代表会议之地，联络南北军之感情，协商赞成共和实行之动作，议定共同进行条件”，并通电

<sup>①</sup> 《张勋穷蹙无归矣》，《申报》1912年2月3日，第340页；《专电》，《申报》1912年2月4日，第348页；《公电：南京粤军北伐经理局电》，《申报》1912年2月5日，第356页；《专电》，《申报》1912年2月6日，第364页；《专电》，《申报》1912年2月8日，第380页；《临时政府公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第21页、第83页。

<sup>②</sup> 《专电》，《申报》1912年2月5日，第356页。

<sup>③</sup> 《专电》，《申报》1912年2月9日，第388页；《专电》，《申报》1912年2月10日，第397页。

张勋：“约定阴历二十三日（2月10日），两方均在符离集会议，彼此派员须有代表全权。”<sup>①</sup>

2月10日，联军参谋团派广东北伐军参谋刘汉帜和镇军参谋乐雨田为全权代表，赴符离集与张勋所派之全权代表陈毓崧和唐宗濂展开协商。会谈中双方围绕徐州归属问题争论不休，联军方面要求张勋让出徐州，退往山东，以示其赞成共和之诚意，<sup>②</sup>而张勋却企图盘踞徐州，坚不相让，致使议和毫无进展。在此情形之下，联军参谋团致电中央：“连商二日，不获要领。且并援段军例（段祺瑞赞成共和后就从湖北退往河南），退出徐州一条，坚不可。可知张勋居心叵测，敝处以奸不可纵，机不可失，公决再行。一面修书致张，令其速发表赞成共和之实证，以冀悔悟于万一。彼仍负固，则敝处当仍照陆军部第一号令施行，业已于本日由宿州向徐州前进。”<sup>③</sup>张勋在看到联军态度强硬，即发表通电遵从共和，率军退往山东，广东北伐军的先头部队随占领徐州。

关于占领徐州的情况，许多记载（包括姚雨平后来的回忆）多言之为“徐州之战”，为了彰显广东北伐军的辉煌功绩，或言“一战而下徐州”，或曰“追敌至徐州北三十里”。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张勋收到联军的劝其赞成共和的修书（有最后通牒性质），又看到联军已经开始向徐州逼近，于是发表通电遵守议和条件，并称徐州土匪蜂起，请联军速来镇压，即率兵退往山东。<sup>④</sup>双方没有发生接触，何以称“徐州之战”，更遑论“追敌至徐州北三十里”。当时姚雨平曾给孙中山发电：“张勋军队即向山东退走，我军因徐州士民之请，刻已进驻徐州。”<sup>⑤</sup>可知，张勋部清军退往山东在前，姚雨平应徐州士民之请进占徐州在后，没有发生所谓的“徐州之战”。

以广东北伐军为主力的联军在津浦线上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彻底粉碎了清军三路进攻南京、扑灭革命政权的军事计划，使南京转危为安，革命政权也因之而更为巩固。这些胜利加重了临时政府在南北议和中的砝码，对促使清帝退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广东北伐军的军事胜利对整个战局都起了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一方面，广东北伐军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东线

<sup>①</sup> 《张勋联络联军之进行》，《申报》1912年2月13日，第421页。

<sup>②</sup> 《北伐联军与张勋联络矣》，《申报》1912年2月12日，第413页。

<sup>③</sup> 《临时政府公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第157页。

<sup>④</sup> 《专电》，《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427页。

<sup>⑤</sup> 《临时政府公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译组编《辛亥革命资料》，第173页。

光复军等军的士气，使他们在与清军争夺宿迁的战斗中最终获胜。另一方面，与西路的浙镇联军对峙的强敌倪嗣冲虽攻占了颍州，但却因为惧怕广东北伐军对其后路迂回包抄而不敢大举进攻。三路大军在战略上的相互配合是宁皖方面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保障。

### 三 战后广东北伐军的裁撤

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颁发退位诏书，袁世凯表示拥护共和，南北议和告成，南北双方之间的战事基本停止。这时，北伐军任务基本完成，北伐军的名称已不合时宜，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发出通电，要求所有北伐军悉改为讨虏军。广东北伐军改名为广东讨虏军（习惯上仍称粤军），姚雨平仍任总司令。

姚雨平统率的广东讨虏军一部驻扎在徐州，总司令部则迁至宿州，部队仍严加训练。当时仍有一些省份为忠清分子所把持，他们拒不赞成共和，尤其是奉天省的反革命气焰甚是嚣张。姚雨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奉天顽部奉命，得罪民国，凡在民国军人，宜申挞伐。敝军奉命讨虏，愿先驱出关，惩彼丑类。”<sup>①</sup>姚雨平向临时政府请缨讨伐奉天未能成行，因为奉天在各方的压力和协调下很快就宣布赞成共和，但这也说明广东讨虏军在战争结束初期仍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反观光复军就是另一幅景象。在时人以和平来临，军队即应裁撤的议论下，光复军总司令李燮和即向临时政府发电请求全军裁撤，卸甲归农，足见该军人人思归，暮气已深。

全国局部地区有影响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广东讨虏军由江淮地区南撤，驻扎在南京城及周围地区。虽然没有了战事，但广东讨虏军在激烈的政治风潮中仍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战事基本结束后，北伐联军参谋团的名称也去掉了“北伐”二字。在南北双方就中央政府驻南京还是北京的争论中，联军参谋团经过商议，于2月25日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中央政府地点应该设在北京。<sup>②</sup>这与陆军部的主张针锋相对，陆军部随即下令要解散联军参谋团，参谋团各军统领不服，申言不承认此项部令，公开与陆军部对抗，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矛盾

<sup>①</sup> 《公电二：宿州粤军司令电》，《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433页。

<sup>②</sup> 《南京政府近闻》，《申报》1912年2月27日，第478页。

与冲突为袁世凯下怀所利用。很快袁世凯集团改革军制、大举裁兵的计划就传了出来，企图削弱南方军队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sup>①</sup>参谋团与陆军部的矛盾借此而告一段落，但这件事却给陆军部以不小的震动，坚定了取消联军参谋团的决心。袁世凯也清楚联军参谋团是一个威胁，于是下令段祺瑞组织成立军队统一联合会作为全国性的军队团体，来达到瓦解联军参谋团的目的。<sup>②</sup>联军参谋团被迫于3月16日向南京临时政府和军队统一联合会发出通电，以“统一政府也已成立，参谋本部已将组织完全，南北军队直辖于中央，不应另有关”为名宣布解散，联军参谋团成员广东讨虏军参谋刘汉帜也代表粤军发出联电。<sup>③</sup>这件事可以看作是驻宁各军由联合走向各自为战的开始。后来袁世凯让段祺瑞组织成立了更大规模的军队团体——军界统一会，结果很快就遭到南方军界的联合反对，被迫取消。

广东讨虏军在战时建立起来的强大影响力依然存在，但却远不能扭转时局。袁世凯虽表面上遵从《临时约法》，但却不愿离开北京，就指使部下在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大肆制造骚乱，以北方形势不稳为由拒绝南下。南京临时政府于3月4日下令东南各军分途急进，直往北京平定叛乱。包括广东讨虏军在内的驻宁各军接到命令后，纷纷发电北京表示准备率军北上平叛。消息一出，北京震动，且不说袁世凯发电阻止广东讨虏军北上，就当时北京各大团体（包括总董事会、总议事会、商务会等）商议后很快就通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及广东讨虏军总司令姚雨平：“此次之变，系少数游勇鼓动，叛者不过一标，现经兵警击散，秩序还复……且北方军队仍足资分布，请释厘注，勿劳大军北来。恐秩序甫定之时，人心复生警疑，反失执事维持大定之初心。”<sup>④</sup>电文中极力将北京及其周围的兵乱说成是小规模的动荡，极力阻止广东讨虏军北上，由此可以看出广东讨虏军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影响。广东讨虏军此举对北方的冲击甚至大有超越兵乱本身之势，这种情况在当时驻宁各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南北双方的政治斗争最终以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孙中山于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中央政府也迁往北京，南京设留守府，黄兴于4月2日被为南京留守。在这之前的3月底南京临时政府就将南方各军进

<sup>①</sup> 《评论：遣散军队刍议》，《申报》1912年3月2日，第509页。

<sup>②</sup> 《军队统一联合会暂行办法》，《申报》1912年2月27日，第478页。

<sup>③</sup> 《公电：南京武昌联军参谋团电》，《申报》1912年3月20日，第659页。

<sup>④</sup> 《北京各团体电阻南军北上》，《申报》1912年3月14日，第612页。

行了一次统一整编。对广东讨虏军的整编，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下令：“准三月三十日陆军部咨开：粤省军队应编成军，非遴选统将不足以资整理。兹经本部申请大总统，以广东讨虏军编为第二十二师，以钟鼎基所统一师编为第二十四师。以二十二、二十四师编为第四军，以广东讨虏军总司令姚雨平为第四军军长，张文为参谋长（军），林震为第二十二师师长，李济深为参谋长（师）。”<sup>①</sup>时局的巨变及军队的整编对广东讨虏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整编的广东讨虏军由地方军变为中央军，受留守府统辖，归黄兴节制，但其军饷主要改归北京政府拨发，这就使袁世凯在很大程度上扼住了他的喉咙，成为其后来解散的深层原因。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虽然财政十分艰难，但政府的开支主要用于军费方面，南方各军的军饷基本能够得到保障。改为留守府以后，一是留守府没有临时政府的影响力去筹饷，二是根据《南京留守条例》的规定也只能从北京政府那里领取，这就使袁世凯占据了主动。

广东讨虏军改编为中央第四军后，就不再受广东军政府的节制了。姚雨平担任第四军军长后，陈炯明组建的心腹军队——钟鼎基的第二十四师也成了姚雨平的部下，这是陈炯明无法接受的。陈炯明本来就忌恨姚雨平北伐军所建立的功勋，因此就更加不能容忍第四军来影响自己在广东的统治。而第四军的一部分军饷是由广东省来承担的，这也造成对陈炯明的某些依赖。

这些变化使姚雨平的第四军处于这三方关系之中：虽成为中央军，却是袁世凯心中的死敌；虽受南京留守节制，却因其软弱而无法得到其应有的支持；虽兵源出自广东，却为陈炯明所不容。它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南京留守府成立后，其统辖的驻南京各军的军饷问题立时凸现。袁世凯对军饷的一味拖欠拒发，使留守府的财政捉襟见肘。当时留守府总参谋李书城是这样忆述那种窘迫情况的：“当时最感困难的问题是南京拥有十余万人的军队，军费没有来源……我不得已，只得把南京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了。”<sup>②</sup>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各军中出现军心浮动。当时清廷遗臣组织的宗社党趁机渗透到南京，成功地煽动了驻南京赣军一部

<sup>①</sup> 姚雨平：《武昌起义后广东出师北伐的经过》，《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86~187页。

<sup>②</sup> 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兴先生的活动》，见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202页。

于4月11日发动兵变。变兵在南京城内白门桥和太平桥一带大肆抢掠，造成了城内的极大恐慌与动乱。而最可恶的是这些变兵竟然打着邻近的第四军的旗号，这使第四军广大将士极为愤怒，因此在平定兵变时毫不留情，以至于使粤赣两军之间结下了仇恨。<sup>①</sup> 战时各军之间建立起来的亲密合作的盟友关系至此也就荡然无存了。

虽然兵变很快就被平定了，但以赣军叛乱为导火索，却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首先，兵变给留守府的主要领导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李书城的一句话可谓相当有代表性：“经过这次兵变，我才认识到有兵无饷的危险。”<sup>②</sup> 留守黄兴所受刺激也不小，对于驻宁各军开始不信任。兵变平定后不久，南京城就实行了戒严，很快就颁布了严格的官兵假期新规，留守府的裁军计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sup>③</sup> 甚至后来将驻宁各军一律改驻城外。<sup>④</sup> 这本无可非议，但无疑使其与各军之间产生了一定的隔阂。其次，赣军问题严重，很快就被遣送回江西，而第四军与浙军鉴于留守府态度的变化及赣军的前事，也都开始筹划返回各自省份。4月30日，第四军的机关枪队第一标（团）千余人开拔回粤，但却引发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这部分官兵带了在固宿战时收留的孤儿寡女同行，结果被当成拐卖人口，引起了一场风波，<sup>⑤</sup> 后经留守黄兴的妥善处理和姚雨平发电对此事原委的澄清，事件便过去了，<sup>⑥</sup> 但却在人民心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对其后来裁撤当不无关系。另一件事是，这些官兵在回到广州后，用所领的临时政府军用钞票购物时为市面各界所拒收，盛怒之下便与市面各界发生了大规模的对峙。后经几个有实力的药方老板倡导通行，军用钞票才为市面各界所接受。<sup>⑦</sup> 此事虽如此了结，但影响却很深，尤其是此事成为陈炯明影响胡汉民（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再次督粤）不许第四军回广东的借口，后来还影响到胡汉民做出裁撤第四军的决定。这样一来，第四军的主体部队就有家难回，只能被迫继续驻扎在南京。

第四军虽然被迫留在南京，但军饷问题并没有解决。留守黄兴对此深感

<sup>①</sup> 《宁垣兵匪暴动详情》，《申报》1912年4月14日，第128页。

<sup>②</sup> 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兴先生的活动》，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202页。

<sup>③</sup> 《专电》，《申报》1912年4月25日，第233页。

<sup>④</sup> 《专电》，《申报》1912年5月3日，第311页。

<sup>⑤</sup> 萧文赏：《广东北伐军见闻录》，《广东辛亥革命史料》，第194页。

<sup>⑥</sup> 《公电》，《申报》1912年5月5日，第332页。

<sup>⑦</sup> 《粤垣通用南京军用票》，《申报》1912年5月17日，第456页。